我请苏步青校长当翻译

“苏老”，是我们复旦大学几代同仁对苏步青老校长的尊称。1955年进入复旦大学之前，我只知道三位复旦教授的名字。

在读初中时，有一位喜爱文学的同学很得意地向我炫耀他正在读的一本书，叫《修辞学发凡》，我发现完全看不懂，但记住了这本书的作者的名字：陈望道，一位中国语言学的大师，复旦大学校长。

1955年夏天，我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就联系上了一位同学的哥哥，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我请他介绍学校的情况。他说复旦理科最知名的教授就苏步青和陈建功两位先生，于是我又记住了这两位。

很荣幸，到复旦第二天就见到了苏先生，那是在登辉堂（编者注：今相辉堂）召开的全校新生大会上。那时苏先生是教务长，主持大会并做了总结。他说：“你们从全国各地到上海来，生活上要好好适应。出了校门就是邯郸路，路上的车子不多，但开得特别快，大家过马路要非常小心，先看左面，后看右面。”

听了这一席话，对于苏先生，我心中除了崇敬之外，更多了一份犹如对家中长辈的亲近之感。一年后，苏先生就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

1964年我和同事李文俊一起研制多年的光散射仪成功了，基于这个先进仪器我们研究高分子溶液性质的学术论文在《高分子通讯》上发表，这是我们教研室第一篇独立发表的学术论文。

初战告捷，我们对未来发展满怀憧憬。我们到高桥化工厂“联系生产实际”寻找课题，最后选定了用Ziegler-Natta（齐格勒-纳塔）催化剂制备聚丁二烯合成橡胶。

课题刚启动，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我们查阅文献时发现，这个领域的权威就是意大利的Natta教授，刚刚在1963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他的文章对我们太重要了，但是对我们最有帮助的、报道了详细实验条件和步骤的一篇文章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当时我们真犯难，意大利文是“小语种”，估计很难找到能翻译的人。

天无绝人之路，我的同事小朱说，他在数学系工作的中学同学小曹和他讲过，苏步青先生不仅是数学大师，也有语言天赋，会六七国语言，其中就包括意大利语，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想想，我们这些无名小辈竟然要自己的校长、顶级学术大师为我们当翻译，也太不合乎常理了，但我们实在舍不得放弃这唯一的机会。

于是我们就请小曹先向苏先生试探一下。不料苏先生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和小朱手捧厚厚的杂志合订本，心怀忐忑地去子彬院（600号楼）的苏先生办公室。

一见面，苏先生亲切和蔼地招呼我们，直奔主题，说：“你们给我出难题了，我的意大利文并不好，有多年不用了，又不懂你们化学的东西，恐怕翻译不好。”

可能由于第一次和学术大师近距离接触，有点兴奋，我竟忘了向苏校长百忙中抽空帮我们翻译表示感谢，而是傻乎乎地回应说：“没有关系，这个文章中化学的名词跟英文也差不多，我们可以猜出来。”他说：“那就好，我们一起合作吧！”

他先打开文献浏览了一遍，接着就从头开始，一句就一句地口译了起来，遇到化学词汇，我就插话补充。遇到不确定处，苏老抬起头来，问问我们的意见。就这样，我把苏先生的口述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大概花了两个小时，苏先生耐心地为我们完成了文章的翻译。我们当然很开心，向苏先生道谢后就告辞了。

这是1965年秋天的事情。后来我有点后悔，当时怎么没有想到问问苏先生，意大利语在我国懂的人不多，他是留学日本的博士，怎么学会的呢？

直到60年后我读了《苏步青传》（王增藩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才知道，这里确实有个很有趣的故事。

1924年春天，苏步青考入了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他发现许多几何学的经典著作都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于是萌生了学习意大利语的愿望，但在日本教意大利语的学校很少。

他碰巧听说大学附近天主教堂里的神父是梵蒂冈派来的一位意大利人，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为了接近神父，他多次进入教堂，引起了神父的注意。相互熟悉以后，苏步青提出要神父教他意大利语的请求，那时神父已经年迈，正在物色接班人，他看中了这位“虔诚”的年轻人，就答应了，而且要他每天晚上到神父家听课。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苦学，苏步青的意大利语果然大有长进，看数学专业书籍已经没有问题了。他心怀感激地向神父表示，自己专业学习紧张，就不再来教堂向他学习意大利语了。

神父大为惊讶，说：“孩子，你错了，只有宗教才能救人类。”苏步青回说：“只有科学才能造福人类。”神父无可奈何，答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你把数学当作自己的宗教。孩子，你去努力吧！”

1978年7月，苏老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我清楚记得，在一次全校大会上，苏老说：“我今年已经76岁了，我什么也不怕了！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几年，我要拼命努力，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天！”苏老的讲话可谓振聋发聩，我们听了无不感动，苏老在我心中的形象愈发高大了。

文/江明（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科学系教授）

原载于“旦苑晨钟”公众号

“‘英勇牺牲’这四个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表述”

2025年秋天，我选修了“AI考古”课程。

这门课由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文少卿、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钱振兴和金城联合开设。三位老师给了我们一种过去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的跨学科训练。

钱老师在课上反复提到一个观点：做技术不能只盯着论文和指标，要做出能产生社会影响的东西，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东西。金城老师在讲授AI图像处理的时候也多次强调，技术要落到实处，要解决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跑数据。

这让我在课程结束后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学了的这些AI技术，到底能用在什么地方？**

恰逢今年清明前后，我注意到一个现实：很多革命烈士牺牲时极其年轻，相当一部分人仅留下少量模糊的档案照片，有些烈士根本没有照片传世。我们说“铭记英烈”，但如果大多数人连英烈长什么样子都无法想象，“铭记”二字就缺少具体的支撑。

如果AI技术能还原他们的面容，让今天的人真正“看见”这些为国捐躯的年轻面庞，这本身就是钱老师所说的“对社会有用”。

选定邓萍烈士作为第一个复原对象是文少卿老师的建议，他对AI在历史人物复原领域的可能性有长期的关注和思考。

邓萍是长征途中牺牲的唯一一位军团级将领，他虽然有少量档案照片留存，但缺少一个具体的、可感知的视觉形象。文老师认为，这正是AI复原技术可以发挥价值的地方——在有限的历史影像和文献基础上，生成一个经得起考证的、有时代质感的面容，让后人能够更直观地认识这位年轻的将领。

复原烈士面貌不是简单的图像处理，而是一个涉及历史考证、AI生成、反复比对和场景设计的系统工程。整个过程中，文老师提供了历史考证方面的指导思路，钱老师和金城老师在AI生成技术和图像处理方法上给予了帮助。

有天深夜，模型终于生成出了一张我觉得“对了”的图：一张27岁青年军人的面庞，棱角分明，目光坚定，嘴角微微上扬的弧度还带着没有完全褪去的少年气。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在我们平时读到的宏大叙事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同龄人。

邓萍牺牲时27岁，比今天大多数研究生还年轻。他本可以有漫长的人生，但他选择在遵义城墙下匍匐侦察，然后再也没有起来。当亲手把他的面容从历史档案中还原出来时，“英勇牺牲”四个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表述，它变成了一张具体的、年轻的脸。

整个项目做下来，我最深的感受是敬畏——对历史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对手中技术的敬畏。

AI可以生成任何面孔，但复原和创作之间有一条底线。每一次调整参数、每一次点“生成”之前，我都在反复自我审问：这像他吗？这有历史依据吗？我有没有把个人的审美偏好强加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身上？

文老师在项目初期说过的那句“没有依据的部分宁可留白”，在后来的每一次迭代中都成了一个提醒。

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理解了一件事：技术伦理不是一个可以在论文里讨论完就放下的抽象议题，它落实到每一次具体操作中的取舍和克制上。

文/汪圩嘉（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2025级硕士生）

跨越认知藩篱：与青春期孩子的平等沟通之道

当女儿把MBTI测试结果拍在我面前时，我盯着那行“ENFJ”的字母，感觉像第一次认识她。在我眼中，她永远是那个丢三落四、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十句答一句的ISFP孩子。直到这份测试报告摆在眼前，我才惊觉，原来我一直用自己的滤镜，定义着一个完全陌生的灵魂。

ENFJ型人格的孩子，天生是人群中的太阳。女儿说，在学校里她经常是那个帮助做值日的孩子，是同学朋友倾诉的对象，是老师眼中的“小大人”。可回到家，她却习惯了收起光芒，因为在我的认知里，“有条理，言出必行”才是这个年龄孩子该有的样子。

J型人格的特质，让她比我想象中更渴望秩序感。她会为了假期小组作业熬夜做视频，会把自己的书桌整理得井井有条，会为了实现目标制定详细的计划。可我看到的，永远是她忘带的课本、乱扔的外套，却忽略了那些被我打断的计划、被我否定的努力。

这场认知的颠覆，让我开始反思亲子沟通的本质。我们总说要“平等尊重”，可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

平等沟通的第一步，是放下“我以为”的执念。当我们不再用预设的框架去套孩子，而是以空杯心态去倾听，才能真正看到他们的真实模样。我开始试着在她分享学校生活时，不再急着给出建议，而是认真地说“听起来很有趣，能再跟我说说吗”；在她制定计划时，不再泼冷水，而是鼓励她“我相信你能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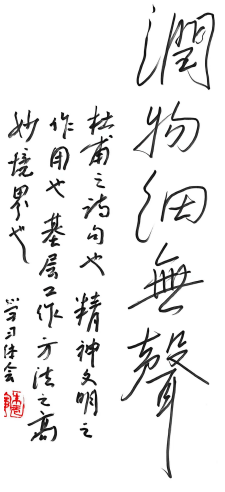
尊重的核心，是接纳与理解。ENFJ型的女儿需要社交的滋养，需要被认可和赞美，需要在集体中找到价值感。我开始支持她参加各种活动，鼓励她邀请同学来家里做客，认真倾听她对人际关系的困惑与思考。我发现，当我不再试图把她塑造成我期望的样子，她反而变得更加自信和开朗。

有效的沟通，需要我们学会“翻译”孩子的语言。他们的沉默，可能是渴望被理解；他们的坚持，可能是在探索自我的边界；他们的“小叛逆”，可能是在寻求独立的空间。

现在，我们会一起讨论MBTI人格的有趣之处，会分享彼此对生活的规划，会在意见不合时坐下来平等协商。我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而是她人生路上的同行者。

文/朱安迪（复旦二附校六(2)班倪诗琪家长）

光影书画



朱元寅（百岁离休干部）

《复旦》编辑部出版 主编：陆柳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电话：65642617 邮编：200433 排印：上海立奇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虹口区三门路763号2楼） 免费赠阅